

當代中國天主教神學教育與文化建構

甘俊邱
廣州教區

一、前言

天主教的大公性特徵，面向所有文化與區域，以文化詮釋信仰乃天主教神學的方法論，「道成肉身」便是信仰進入文化的最佳詮釋。當代中國天主教面臨「中國化」議題，實則從唐朝開始，基督信仰便開始以漢語詮釋信仰，在明朝與士大夫的文化互動，為天主教文化抒寫了濃厚的筆墨。

中國天主教的神學教育主要在修院中建構，從無到有的艱辛創建歷程一言難以蔽之。修院的神學教育從之初主要聚焦於牧靈，後期發展中逐漸具備神學學術化的教育。神學一詞給人以堂奧與神秘之感，似乎難以窺探其貌，但神學的任務就是詮釋啟示，不因隱晦艱澀而產生距離感。故此，神學是否要遠離教友大眾？梵二精神已經給予了答案。如何促使神學惠及教友，此乃當下中國天主教會努力探索的方向。

天主教文化的方向即進入社會空間，體現其公共價值，教會的大公性昭然揭示出此點。天主教的文化豐富而多元，建築、繪畫、音樂等藝術面向傳承至今；博愛、寬恕、包容等精神蘊涵一以貫之；地方傳統文化、習俗、禮儀等兼容並蓄。本文中國天主教的文化維度僅聚焦於出版社、研究所、學術期刊和研討會層面，以探察教會文化與神學學術脈搏，一窺當下中國天主教的文化格局。

美國天主教神學家 David Tracy 指出教會文化使命的公共性，即進入社會公共領域，就如聖言進入了世界，此亦是中國天主教神學與文化所探索的方向。本文首先勾勒當代中國天主教的神學教育發展；繼而梳理教會的文化事業；最後闡釋天主教文化之建構，並走向公共領域。

二、神學教育

（一）修院神學教育

中國天主教修院¹發展歷經三十多年，從修院恢復之初，到如今初具規模的修院體系，其間經歷諸多困難。中國天主教各大修院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恢復與創建，修院系統處於百廢待興的狀態。關於修院的神學教育，可以劃分三個階段：牧靈實踐階段、神學教育規範化階段與學術化階段。

以時間段來劃分，可將上世紀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的修院神學教育作為牧靈實踐階段。修院於八十年代開創之初，萬事欠佳，連聖經都缺乏，更奢談神學教育。修院教育的重任落在神父身上，老神父們坐監幾十年，與梵二擦肩而過，神學理念無法更新，仍然是梵二之前的狀態。其次是神學教材和參考資料十分匱乏，老神父們只好將過去修院用的拉丁文教材翻譯成中文，油印一些書籍，作為教科書。繼之，修院的神學教育重點在於牧靈，神職青黃不接，急於用人，而實踐操作性的教育便是重中之重。九十年代的修院教育大為改觀，港澳臺神職的間歇性到訪與教學，給修院神學教育帶來的更新動力；無論是神學理念、教學或圖書的擴充，無疑為修院未來之瞻望開拓了視野。

以留學海外的神職陸續歸國，服務於修院為界，可稱為神學教育規範化階段。九十年代留學海外的神職陸續歸國，服務於修院；人才培育不斷接續，據 2003 年的不完全統計，已有百餘名司鐸分別在美國、義大利、法國、德國、比利時、韓國等國學習深造²。基於多重因素考量，留學海外的神職畢竟有限，主要集中於華北和西北，故此比較受益良多的有北京、河北和西安修院，這個局面的形成亦引發日後多個修院陸續解散與合併的潛在因素。海外求學的神職深受大學教育的學術化訓練，具備基本的學養與教學能力，課程設置基本涵蓋神學教育系統，逐步走上規範化的神學教育。

2013 年“兩個辦法”的實施意味著啟動神學教育的學術化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

¹ 本文中修院與神哲學院互換使用。

² 陳建明，〈修院教育二十年簡輯〉《中國天主教》（2003 年第 5 期），48 頁。

³第八條規定：「國家實行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第八十四條規定：「宗教學校教育由國務院另行規定」。因此，宗教教育不屬於教育部管轄，而是屬於宗教事務部門。2012年11月5日，國家宗教事務局公佈《宗教院校教師資格認定和職稱評審聘任辦法（試行）》和《宗教院校學位授予辦法（試行）》（下文簡稱「兩個辦法」），於2013年1月1日起實施。天主教神哲學院依據兩個辦法的實施⁴，極大的推動修院師資團隊的優化管理與運作，且可開設研究生班，為促進神學教育學術化更上層樓。至2017年，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常駐有七位博士，六位碩士；河北神哲學院常駐有四位博士，六位碩士；西安神哲學院常駐有三位博士，七位碩士；且各修院外聘教師資源豐富。中國天主教的神學教育為開設研究生班奠定了基礎，神學教育的學術化階段由此展開。

二十世紀下半葉，教育的普及化亦促進教會對神學教育普及化的反思，神學教育不應寓居於學院寶塔，更應惠及天主子民，深入平信徒的生活中。所以，神學教育應面向平信徒，並力促神學教育的普及化。

（二）教會牧民中的神學培育

中國人口基數大，且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普通高校畢業生每年呈遞進的態勢，2017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達795萬人⁵。由此可知，社會文化結構與三十多年前大為不同。因此引發天主教針對教友的牧民亦應有所改觀，探索針對城市和農村的牧民策略乃當務之急。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針對教友信仰培育的材料首推《要理問答》⁶。這部《要理問答》提供教友最基本的「信仰、倫理、禮儀、祈禱」的教導。首先針對兒童信仰培育；「第1問，你為什麼生在世上？答：為恭敬天主，救自己的靈魂」，這一經典問答表述深深的鐫刻在兒

³ 關於宗教教育檔，1982年《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2007年《宗教院校設立辦法》；有的研究者建議推動宗教立法與宗教教育立法。婁雨，〈梵二背景下對修院教育的教育哲學理論探討〉，2012年中國天主教紀念梵二召開五十周年研討會論文。

⁴ 《天主教神哲學院教師資格認定辦法實施細則》（試行）、《天主教神哲學院學位授予辦法實施細則》（試行）。

⁵ 2005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達338萬人；2010年：631萬人；2015年：749萬人。

⁶ 卷一，當信的道理（107問）；卷二，當守的規誡（92問）；卷三，七件聖事（130問）；卷四，祈禱（48問）。

童記憶中。姑且不論其所表達的神學含義是否與當代神學相契合，只論其教理講授推廣的實際功用而言。實則這部四卷《要理問答》已成為每一個教友家庭必備之書。總之，中國教會在沒有聖經的年代裏，《要理問答》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⁷。現今對於該《要理問答》教理講授極少使用，但也沒有發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培育教友信仰的牧民方案，在破與立之間，《要理問答》所帶來的影響極具啟發性。

教區層面的牧民培育不斷在深化與探索。由於資源的有限，無論人力物力，優化資源成為必要考慮的範疇。因此，教區層面的統籌安排成為首選，教區性的牧民培育逐年增多，對於教友的牧民培育多元而深化，聖經學習班，夫婦懇談會，教理培訓班等等，已經不再局限於過往的單一教理層面講授，多元化的培訓不斷在探索，而且持續有深度的當代神學理念蘊涵其中，且推動融入教友的生活中。例如廣州教區連續多年不間斷舉辦教友培訓班，涉及聖經、倫理、福傳等內容，參加培訓的教友不僅提升自我的信仰，亦會成為當地堂區的骨幹，推動堂區的發展。教區層面的牧民培育，雖然無法給予深度的神學培育，但在多元化深層次方面不斷推進，對教友信仰品質的提升提供了助力。

梵二天主子民的概念所蘊含意義豐富，關涉教友接受神學教育自不例外。雖然梵二後逐漸推廣教友神學教育，但在不同區域的操作難度亦不同。中國教會針對教友的神學培育是缺失的一環，甚至神哲學院都沒有面向教友開放，唯有教區自身探索與拓展。廣州教區於 2015 年嘗試開辦「教理講授班」，為期兩年，涉及近二十個神學課程⁸，邀請有資質的神父及香港培育中心的老師授課；北京教區於 2012 年開始，嘗試針對教友的系統神學培育，開設「平信徒高級進修班」，授課師資來源於北京的兩所神哲學院以及北京教區，學制兩年，週六全天課程，內容涉及三十多個神學課程，參與神學教育的中青年教友的比例頗高。教省或總主教區以其豐富的文化資源，針對教友的神學培育應率先而行，為城市教會而言，類似模式的操作性可行，亦為中國教會對教友的神學培育提供了範本。

⁷ 參段春生，〈天主教復興運動的要理問答——並分析其對中國教會的影響〉《鼎》（2017 年，第 37 卷，總第 185 期）。

⁸ 課程包括聖經新舊約背景入門、梅瑟五書、對觀福音、宗徒書信、聖詠、歷史書、教會歷史、基督徒倫理、教會訓導、倫理神學、聖經神學、成年教理講授、青年培育、聖事禮儀、教會婚姻、祈禱生活、宗教對話等等。

中國教會針對教友的培育不斷探索，隨著時間的推移，過往單一的教理講授無法充實教友的信仰生活，於今的各種培訓班層出不窮，甚至神學的系統培育亦在探索之中，折射出教友對於信仰需求理解的活力。

三、文化事業勾勒

(一) 出版社

中國天主教至今有三家出版社，為中國天主教的文化事業做出了不菲的貢獻。「河北信德社」自 1991 年成立，出版社從之初的禮儀工具用書，逐漸延伸不同種類的圖書，涉及聖經、倫理、信理、禮儀、靈修、牧民、文史、傳記等類別，近三百種書籍，近年亦有國內神職的著作，田春波《創世神學》、田煒帥《陸征祥與中國教會》等，呈現出國內神職與教友學者的研究成果。信德社為應對教會之需，針對中國教會及各地大修院嚴重缺少中文教材及參考書的現象，自 2009 年開始，信德文化研究所與各地修院及基金會等合作啟動了大修院教材叢書專案，決定翻譯和出版事宜，並再版了一批港臺教材書。

1984 年，上海教區沿用原「光啟社」的名號，成立了集研究與出版為一體的學術出版機構，開始編輯和出版聖經及各類聖書。成立之初，光啟社集大量精力於翻譯、編輯、出版雜誌《海外天主教動態資料》和《天主教研究資料彙編》，盡力把普世教會在過去三、四十年中的變化和教會的最新動態介紹給中國教會和學術界。光啟社應一時之需，率先出版了《主日彌撒讀經》、《平日彌撒讀經》等禮儀用書，推動了教會禮儀改革的進程。後陸續出版臺灣與香港的書籍，亦出版國內神職的著作，如趙建敏《天主教社會教義導讀》，高超朋《基本倫理神學》等，出版社涉及聖經、靈修、牧民、倫理、禮儀、傳記、家庭教育等，出版四百多種書籍。

「上智編譯館」由首位國籍樞機田耕莘主教於 1946 年在北京創立。編譯館創立之初衷，以編譯書籍為主。1997 年上智編譯館獲准在教會內部恢復成立。由於梵二會議後，中國的天主教會並未能夠在神學思想上跟上普世教會的步伐，故上智編譯館將按照梵二會議後的神學思想，編譯書籍，並盡力將福音與中國文化相結合，且在文化中紮根生長。上智編譯館陸續出版翻譯與編撰之書籍，如王和平譯《牧靈服務倫理學》、王依撒伯爾譯《第三千年的天主教思想與生活》、雷立柏《聖經概念詞典》等，出版圖書近百種。

此三家出版社出版的書籍，無論是出版港臺神學書籍，亦或是國內教內學者的書籍，

大都集中於教會基本的神學作品，應時代之需，以解燃眉之急。出版社應大量推呈新的神學作品，並提升書籍的印刷品質，以與社會出版物同步。

（二）文化研究所

中國天主教目前創辦了一個神學研究中心與兩個文化研究所⁹，一個是河北的「信德文化研究所」，一個是北京的「天主教與文化研究所」，兩個文化研究所相繼成立，在近年的天主教文化事業發展中貢獻卓越。

1. 神學研究中心

1986年11月，中國天主教第二屆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該次會議之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增設了「神學研究小組」，負責神學研究工作。1992年，在中國天主教第五屆代表會議上，主教團將原來的神學研究小組更名為「神學研究中心」。

2004年中國天主教第七次代表會議之後，在中國天主教神學研究中心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國天主教神學研究委員會」，成為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下設的委員會之一。其宗旨是根據天主教會的傳統和中國教會的實際情況，在教會內推動並開展神學探討和研究。

2. 信德文化研究所

「信德文化研究所」於2001年9月由張士江神父創辦。信德文化研究所的成立是為回應中國社會和教會的快速發展需要，填補內地教會在學術研究領域的空白，嘗試從教會和社會兩個層面研究基督信仰及其思想文化，推動中國教會、神學和禮儀的本地化進程，為教界和學界提供探討、研究和交流的學術平臺。

信德文化研究所主要側重四個方面：首先廣泛收集各種學術資料資訊，與各宗教團體、學術機構加強交流。其次設立「學術獎學金和研究基金」，資助國內學者的專題研究。第三組織專家學者，有計畫和有系統地從教會與社會相結合的角度進行學術研討會。最後出版不定期學術刊物、論文集，並與社會出版機構和學者合作，編輯翻譯出版神學、聖經、神修教材、工具書及教會思想文化名著，協助國內學術界整理、出版一些歷史資料。

⁹ 本文暫且不探討河北獻縣教區新近成立的「北辰文化研究所」，2015年4月30日成立，研究所於10月6日舉辦「基督徒家庭與婚姻研討會」；2016年10月舉辦為期五天的第一屆天主教社會訓導研習會。

3. 天主教與文化研究所

北京天主教與文化研究所經北京教區批准於 2002 年 8 月 3 日正式成立，所長為趙建敏神父。研究所旨在推動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對話和交流，其宗旨著重在強化基督信仰，尊重民族文化傳統，探索追求真理，並推動宗教對話。

研究所的目標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1、開展天主教神學和文化方面的學術研究。2、促進教會內學者與教會外學者的溝通與對話。3、為天主教神職和教友學者提供學術平臺。4、開展與國外基督宗教的學術文化交流。5、編輯並出版天主教學術研究資料。

天主教與文化研究所隨著時間的推移，取得不菲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學術會議；特別以天主教與文化、天主教與倫理等議題為主的會議。其次是《天主教研究論輯》期刊。第三是特別研究專案。第四是上智獎學金專案；為促進天主教研究工作，研究所於 2007 年 1 月 6 日設立上智獎學金專案鼓勵大學和宗教研究所天主教方向的研究人員。

教會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的成立，其首先在教會內發酵，促進教會的神學學術研究不斷向縱深推進；且力促教會與社會的學術互動，為社會學者認知教會，聆聽教會的聲音搭建了平臺。

（三）學術期刊與研討會

1. 學術期刊

中國天主教主要有三種神學學術型刊物，《神學研究》、《天主教研究論輯》和《信德學刊》，三種刊物分屬上述研究中心和文化研究所，其不同的出版性質，影響出版物的發行量與人群。

中國天主教神學研究中心於 1996 年開始不定期編輯出版《神學研究》刊物，現以半年刊發行。刊物投稿人主要以教會學者和社會學者為主，學術性強，內容涉及神學譯文、信理、倫理、福傳與文化、教史等內容。其所面對的人群，無論教會與社會，也大多屬於學術圈的人士。由於該刊物屬於內部資料，其內部資料的屬性，導致無法廣泛的受到社會學界和教會的關注，由此亦可知其發行量之局限性。

信德文化研究所自 2001 年成立以來，出版了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信德學刊》。該刊物主要以研討會的論文為主，屬於專題刊物。由於研討會所邀請人士範圍廣泛，但刊物所

擇取之論文，從學術角度而言參差不齊，不僅有社會學者和教會學者，亦有牧民神職及教友，例如 2013 年的城市化與移民。由此可知該刊物的定位，兼顧學術與通俗，其運作之匠心難能可貴。

北京天主教與文化研究所主辦的《天主教研究論輯》於 2004 年首輯正式出版。該刊物以年刊形式刊行，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是中國天主教唯一在社會出版的學術期刊，亦成為大學、學院及學術機構認知天主教的一個學術窗口。該期刊內容涉及神學理論、神學家研究、教史、宗教對話與文化、聖經、倫理、禮儀與社會實踐等內容，其主要投稿人士大多屬於社會學者，且以中青年學者為主力。

2. 神學研討會

神學研討會之運作主要有三個層面，主教團、文化研究所與教區層面，對於各層面所舉辦之研討會簡單羅列如下：

（1）主教團層面

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於 1987 年 3 月 7 日，在南京召開了改革開放後首次神學研討會議，主要探討教會與文化之關係，指向建構中國的神學思想。1995 年在北京，主要探討計劃生育問題。2002 年，在南京召開了民主辦教的專題研討會。2010 年，在北京舉行紀念利瑪竇逝世 400 周年的研討會。2012 年，北京「教會本地化神學研討會暨紀念梵二會議召開五十周年」。2017 年，在銀川舉行天主教中國化研討會。

（2）文化研究所層面

北京天主教文化與研究所於 2002 年召開以「當代天主教與文化」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2003 年主題為「當代天主教與倫理道德」，2005 年主題為「天主教社會理論與現代社會」。該文化研究所於 2008 年首次舉辦「天主教研究青年學者論壇」，與會的青年學者中大部分是在各地社會科學院進行天主教研究（或基督宗教研究）或在大學的宗教系進行研究，至今已陸續舉辦十屆研討會¹⁰，其規模與影響力逐年增加。

¹⁰ 第一屆論壇有 50 多位青年學者在論壇發言。第二屆論壇共有 44 位學者在會議中宣讀了論文。第三屆論壇提交論文學者 72 人。第四屆論壇提交論文學者 64 人。第五屆共 40 多位學者發言。第六屆論壇共 64 位學者提交論文。第七屆論壇共 62 位學者發言。第八屆論壇共 71 位青年學者發言。第九屆論壇共 96 位青年學者提

信德文化研究所歷年舉辦了主題不同的研討會，「宗教與環保」、「宗教與倫理道德」、「基督信仰與現代媒體」、「宗教與公益事業」、「城市化與移民及牧民照顧」、「中國民間兒童養育」、「基督教在當代中國的社會作用及其影響」、「正定教堂慘案暨宗教在戰時的人道主義救助」學術研討會。2017 年在江西南昌舉辦「利瑪竇與南昌：教會中國化暨本地化」研討會。

(3) 教區層面

中國天主教在教區層面於近年陸續開辦研討會，展現出地方教會對教會學術文化的建設與認同。上海教區於 2010 年的徐家匯主教府小聖堂舉辦了為期兩天的「天主教上海教區紀念利瑪竇神父逝世 400 周年研討會」，2012 年「紀念聖方濟各·沙勿略誕辰 500 周年福傳年研討會」。廣州教區於 2012 年舉辦紀念梵二五十周年研討會，2017 年舉辦天主教中國化研討會。南京教區於 2015 年舉辦「利瑪竇與神學本地化」研討會。海門教區於 2016 年舉辦成立 90 周年暨中國天主教本地化和中國化神學研討會。

學術期刊與研討會折射出中國天主教的神學學術動態，學術品質漸入佳境，但亦呈現出一個現象，即社會學者的身影居多，而教會神職學者的身影寥寥無幾，這一現象值得教會深度反思。

四、天主教文化之建構

(一) 學界之教會研究

中國學界對基督宗教之研究經歷了不同的階段，其作品受社會思潮、時代變遷和政治形勢之影響，形成了近年文化學術方面出現的「基督宗教熱」、「文化基督徒」與「漢語神學」之態勢。

現從三個幅度來看學界對基督宗教之研究，首先是基督宗教研究的機構。這些機構大

交了論文或提要，83 位學者在論壇上發言。第十屆論壇共收到 87 名青年學者的報名表和提要，共有完整論文 72 篇。

體上屬於四個系統¹¹：1、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各省社會科學院下屬宗教研究所。2、政府職能部門的宗教研究機構。3、基督宗教系統的神學院校和研究機構。4、高等院校相關院系和宗教研究機構。這些研究機構成立時間不同，亦分佈不同區域，研究基督宗教的面向多元，從多角度展開對基督宗教的研究，尤其是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員豐富、關涉領域廣泛，其成果顯著。

繼之探討基督宗教研究人員。對於研究基督宗教的研究人員，總體從時間劃分為二十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以及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有的學者以老、中、青三代來稱謂，有的以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來區分¹²。對於基督宗教之研究受到時代背景的衝擊與影響，第一代學者對於基督宗教研究受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較多；第二代學者於改革開放後逐漸呈現出客觀傾向；第三代學者自身的專業背景，從文史哲轉向，其學術訓練扎實，學術功底深厚。基督宗教研究人員承前啟後，在整個社會氛圍中，為打造基督宗教文化公共化之鋪展做出了矚目的貢獻。

最後探討對於基督宗教研究之貢獻。八十年代後半期以來，基督教學術書籍在大陸零星出版，到九十年代日漸增多，從宗教類型的基督宗教文化譯著到神學譯著、百科全書、辭書、史書，紛然繁陳。首先是工具詞典類用書；主要有《基督教文化百科全書》（1991）、卓新平編《基督教小辭典》（2001）、雷立柏編《基督宗教知識辭典》（2003）、趙建敏譯《現代天主教百科全書》（2012）等。其次是叢書類¹³；從 90 年代下半葉起，屬於出版翻譯作品的叢書，如《歷代基督教學術文庫》、《西方傳統：經典與解釋》、《歷代基督教經典思想文庫》、《基督教文化譯叢》以及《宗教與世界叢書》等；最後是期刊類¹⁴；學術界影響比較大的有以下幾種：《基督宗教研究》（年刊）、《基督教文化學刊》（半年刊）、《宗教與文化》（不

¹¹ 陳建明，〈中國大學基督教研究的現狀與意義〉，羅秉祥、江丕盛編，《大學與基督宗教研究》（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2002），175 頁。該作者 2002 年的初步統計，大學中與基督教研究有關的單位有：北京大學宗教學系、武漢大學宗教學系、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福建師範大學宗教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清華大學道德與宗教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復旦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華中師範大學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鄭州大學宗教研究所、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山東大學宗教研究所、中山大學宗教文化研究所、陝西師範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

¹² 參何光滬，〈江山代有人才出-20 世紀末 21 世紀初中國基督教研究學者素描〉《銅仁學院學報》（2009 年 6 期）。

¹³ 郭海良，〈1980 年以來國內基督教研究評述〉《歷史教學問題》（2006 年第 6 期），89 頁。

¹⁴ 郭海良，〈1980 年以來國內基督教研究評述〉《歷史教學問題》（2006 年第 6 期），88 頁。

定期)、《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叢刊》(不定期)、《宗教》(年刊)、《國際漢學》(年刊)等等。社會各類型的基督文化研究出版品星羅棋佈，在此不做羅列，足以證實基督文化研究的繁榮現象。

(二) 神學智庫與文化

社會學界對教會之研究碩果累累，中國教會亦應在神學與文化建設方面加大力度，給予足夠的重視。中國天主教應建立神學智庫人才儲備，促進神學學術研究。中國天主教留學海外的神父修女人數不少¹⁵，主要留學於美國、義大利、比利時、德國、法國、菲律賓等，可以劃分為學術型與牧靈型。大多數留學歸國的神職修女屬於牧靈型，獲得碩士學位後便服務於堂區或其他機構，後期疏於或欠缺學術平臺及研究能力，而止步於牧靈。獲得博士學位者居於少數，學術型人才更為稀缺，後從事於學術研究大多依託於修院教學或研究所的平臺，例如趙建敏、戎利納、李景璽等，致力於神學教育與文化建構。

主教團與教省層面亦應統籌神學人才資源，以優化、共用資源。主教團不定期召集留學歸國神職人員代表座談會，首次於 1998 年 6 月西安召開，2001 年 8 月第二次在重慶召開，最近於 2015 年 12 月在廣西南寧。主教團亦應建立神學人才智庫，逐步推展神學建構方案，翻譯神學經典與創作神學作品。因應時代問題，通過課題組研究以認知當下的中國教會處境，例如城市化、移民、留守兒童等牧靈問題，應對時代徵兆，而提供神學與牧靈方案。教會教省亦然，統籌該教省轄區之神學人才¹⁶，集合教省的神學資源，推動教省的牧靈發展，以達到資源共享最大化。

教會亦應推動教友研究神學。教會應該規避神職主義，以神職為中心而忽視教友的神恩，教會應大力推動教友服務的神恩，充分發揮教友之所長，以建樹教會。中國教會為數不少的教友任教於大學，有其自身的學術背景，且依據其自身的學術能力，零散的涉及教會研究，為神學貢獻其一己之力。教會應整合教友的學術資源，例如上海教區的「上海市

¹⁵ 例如，自 1991 年以來，截止 2017 年，美國的瑪利諾會幫助培養了 138 名中國教會的神父修士修女，他們來自中國教會的 40 多個教區。

¹⁶ 留學海外的神父修女主要位於華北、西北地區。例如目前北京教區留學歸國的有 6 位博士，25 位碩士。河北獻縣教區有 3 位博士，5 位博士研究生，19 位碩士，4 位碩士研究生。

天主教知識份子聯誼會」¹⁷便是一例，不同教省亦可酌情推展類似團體，以文化服務教會。教友對神學之研究有據可查，正如明末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和王征等士大夫的文化貢獻，不僅參與禮儀及天主譯名的嘉定會議，且力薦教會信仰與文化於社會，奠定教會在明朝的宗教地位，護教力度之大，為教會在明朝的傳播功不可沒。中國天主教的神學與文化之建構，需教友的鼎力為之。

中國天主教文化建構的匱乏之處，莫過於對文化支持力度薄弱。其一，神職忙於牧靈，即使閒暇時間也無心讀書，無法彌補過往由於神學教育之不足而帶來的缺憾，亦無法更新神學理念，甚至充斥著讀書無用論的思想。神職是推廣文化讀物的重要推手，例如信德報訊，西直門教堂於 2015 年 4 月 19 日從信德社首批購買 600 本《福音的喜樂》一書，向廣大教友免費發送。其二，出版社圖書發行量低；例如北京上智編譯館 2016 年出版的《第三千年的天主教思想與生活》，印數兩千冊；河北信德社 2014 年《遇之妙》印數三千冊。面對如此龐大的教友群體，反而圖書發行量低，售出量低，意味著天主教文化讀物自身推廣不足。

當下的中國天主教，需要建構神學智庫，儲備神學人才，推動神學研究，推動教友參與教會的文化建構，體現其知識份子建樹教會的神恩。中國教會是逐漸走向城市化的教會，文化是城市教會的主要特徵，需大力推廣教會文化讀物，通過文化展開城市牧靈與福傳。

（三）天主教文化的公共性

天主教文化本身便具有公共性特徵，正如「大公教會」所明示一樣。美國神學家特雷西 D.Tracy 提出關於神學的三種公眾空間：學府、教會與社會¹⁸，神學與文化是教會關注社會公共領域的路徑，教會應關注「公共性」議題，以進入社會的「公共空間」。

隨著世俗化的漸進，基督信仰的公共性受到強勢挑戰，逐漸式微於私人領域。信仰的私人化是對大公教會的挑戰，歐洲教會遭遇的危機尤為迫切，信仰變成個人的範疇，而缺

¹⁷ 「上海市天主教知識份子聯誼會」是由上海市天主教界知識份子所組成的教友團體。由朱仲剛等教授於 1986 年 6 月創辦；截止 2010 年，在冊會員有 600 餘人。

¹⁸ 陳佐人，〈教義、神學與文化基督徒——神學類型學之考察與反思〉《文化基督徒：現象與論爭》（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246 頁。

乏教會與團體的意向，教會感蕩然無存，基督信仰自身的公共性湮沒於私人領域。正如美國的聖誕問候，由「聖誕快樂」轉變為「節日快樂」，基督信仰的特徵被俗化。

中國天主教文化應進入公共空間，與社會互動，逐步消融社會與教會之間存在的兩種誤區。首先是社會對教會的誤解¹⁹；學界在初期受制於意識型態的影響，有取捨地引用國外的資料，或誤解、歪曲基督宗教，在社會引發效應，例如學校教育課本對基督信仰的偏見；2006年十位博士抵制聖誕節；2010年十位教授反對在孔子家鄉曲阜建立教堂²⁰。第二種是中國教會對於社會事務的回避態度，似乎社會與教會無關。此種脫節是雙向的，教會無力關注社會，社會也難以認識教會。繼而轉向內在的靈修，靈修傾向於非世俗的事務，而社會與政治的事務被視為世俗的事務。

天主教進入社會的公共場域，正如過往神父、修女的形象與慈善事業一同深刻烙印在國人印象中一樣被社會認同。不僅如此，中國天主教在歷史中已經明證，明朝傳教士帶來的不只是信仰，而且也有西方文明與科技，曆書、天文、地理、水利、物理、數學、幾何、醫學等這些科技造福當代的人民，也惠顧及後世。中國當代天主教亦然會秉持教會的大公性與服務精神進入社會空間，為社會服務。

天主教的大公性將有助於構建社會的公共價值。正如特雷西在其著作《類比的想像》中言道：「當神學忠實於其自身的內在要求即公共性，它將有助於學界和社會的公共價值」²¹。中國學者卓新平指出，教會通常對社會採取兩種態度：一種是對社會的批判態度，即所謂的先知精神傳統；另一種則為對社會的服務態度，即所謂的僕人精神傳統。在中國文化氛圍中，更多地選擇了後者，即以僕人精神來推行其社會服務²²。此說明教會在社會中的定位，教會的服務角色，並以一貫的精神在社會體現其公共價值。

¹⁹ 王曉朝把 1980-90 年代學者對基督信仰的研究存在著誤解，歸結為五方面：一、對基督宗教的起源及其創始人耶穌之誤解；二、對基督宗教與羅馬帝國關係之誤解；三、對基督宗教與西方古典哲學關係之誤解；四、對基督宗教與西方中世紀關係之誤解；五、對基督宗教與近代人文主義關係之誤解。王曉朝，〈清除中國學術界對基督教的五大誤解〉，收錄羅明嘉、黃保羅主編，《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關於中國處境神學的中國—北歐會議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4），262-291 頁。

²⁰ 張闊，〈處境神學—中國天主教神學方法論思考〉《神學論輯》（188-189 期，2016 年），402 頁。

²¹ 李烜，〈學界、教會與社會—對特雷西公共神學思想之管窺〉《基督宗教研究》（第十四輯，2011），96 頁。

²² 謝志斌，〈從政治神學、公民宗教與公共神學的差異談三者在中國處境的可能性〉《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38 期（2013 春），93 頁。

中國當代社會所盛行的教會節日，如聖誕節、諸聖節（萬聖節），從經濟創收角度推廣於市場，而「上帝是顧客」這一用語卻逐漸淡出營銷市場。當下所流行的共享經濟理念，共享單車，共享汽車、共享雨傘等不斷推陳出新。共享是指「使用而非擁有」，共享經濟不僅是一種經濟模式，而且更是一種價值理念；共享經濟的提出，從經濟的角度指出人對事物的分享而非佔有的態度。實則聖經創世紀便已指出共享的內涵，創世紀指出人管理取用，而非擁有（創一 28），因為天主是創造者，擁有者，而人是管理者與使用者，世上所有事物都應被共享，而非個人佔有。社會從經濟角度擇取教會節日和理念，揭示出教會應該分享信仰與文化這一事實，且督促教會深度詮釋信仰寶藏，推行教會神學、藝術和禮儀，以期共享於社會。

天主教的大公性特徵意味著走向公共領域的使命，中國教會應分享信仰的寶藏，正如「人類命運共同體」²³與「共享經濟」理念的推行不乏教會在中國歷史中耕耘的因素。當代中國天主教肩負共享的使命，構建天主教文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共享社會。

五、結論

中國天主教三十多年的歷程中，整體發展態勢漸進，神學與文化的創建力度雖然比較薄弱，進程緩慢，卻厚積而薄發。尤其修院的神學教育經歷了從之初的牧靈實踐，發展到如今初具學術化的神學教育階段。梵二會議後，神學教育逐步面向教友，中國地方教會亦在不斷探索教友的神學培育，各種模式循序創新。神學教育的使命指出其方向，神學不應止步於修院，應走向教友；亦不應止步於教會，應走向社會公共領域；讓社會共享教會的神學理念，以服務於社會。

中國天主教的文字傳媒事業初步形成，但在其創立階段卻舉步維艱、內外交困。中國天主教的文化事業彳亍而行，由開始的步履艱難，經歷發展中的進退維谷，到如今的不斷發力，文化事業的基本局面業已形成。教會出版社的書籍涉獵內容豐富，逐步建樹教會的人文結構；文化研究所對課題的研討，促進中國教會認知社會，不斷調整牧靈策略；不同層面的學術研討會的開展，展示出天主教對文創事業的積極關注。

²³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十九大報告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學界對教會的研究，為教會開闢了文化建構的場域。學界研究雖經歷意識形態到學術客觀的轉變，但其對教會的貢獻不容小覷，學界研究內容之廣泛，研究人員之豐富，研究成果之顯著，呈現出學界的先知性聲音。雖然「中國大陸大學對基督宗教的研究，在改革開放後，在進路上是人文的，而不是教會的」²⁴，但學界的貢獻不容否認，將教會推向了社會，走向公共領域。

教會神學與文化的公共性特徵，亦指出教會發展的公共領域方向，以進入社會公共空間。中國教會需要建立神學人才智庫，通過對神學的研究，高屋建瓴，為教會之發展提供方向。特雷西認為，所有的神學都應體現一種進入公共性的姿態²⁵，此公共性方向指示出中國教會自身不應逃避社會公共性議題，否則自身便被排斥於社會之外，而日久形成的個人靈修，讓教會人士對社會議題唯恐避之不及，導致教會自身固步自封。教會應關注「公共性」議題，通過關注社會公共領域的路徑，以進入社會的「公共空間」。

參考資料

1. 王曉朝。〈清除中國學術界對基督教的五大誤解〉《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關於中國處境神學的中國—北歐會議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4），262-291 頁。
2. 李烜。〈學界、教會與社會—對特雷西公共神學思想之管窺〉《基督宗教研究》（第十四輯，2011），83-107 頁。
3. 何光滬。〈江山代有人才出-20 世紀末 21 世紀初中國基督教研究學者素描〉《銅仁學院學報》（2009 年 11 月，第 11 卷第 6 期），1-7 頁。
4. 郭海良。〈1980 年以來國內基督教研究評述〉《歷史教學問題》（2006 年第 6 期），87-92 頁。
5. 婁雨。〈梵二背景下對修院教育的教育哲學理論探討〉，2012 年中國天主教紀念梵二召開五十周年研討會論文。
6. 陳佐人。〈教義、神學與文化基督徒——神學類型學之考察與反思〉《文化基督徒：現

²⁴ 賴品超，〈基督徒合一與當代中國的基督宗教研究〉《天主教研究學報》第一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0），66 頁。

²⁵ 李烜，〈學界、教會與社會—對特雷西公共神學思想之管窺〉《基督宗教研究》（第十四輯，2011），104 頁。

- 象與論爭》(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228-254頁。
7. 陳建明。〈中國大學基督教研究的現狀與意義〉《大學與基督宗教研究》(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2002),175-197頁。
 8. 張闊。〈處境神學—中國天主教神學方法論思考〉《神學論輯》(188-189期,2016年),386-415頁。
 9. 謝志斌。〈從政治神學、公民宗教與公共神學的差異談三者在中國處境的可能性〉《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38期(2013春),87-110頁。
 10. 賴品超。〈基督徒合一與當代中國的基督宗教研究〉《天主教研究學報》(第一期)(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0),55-74頁。